

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 尹西明 陈勃

齐鲁策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推动形成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并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这进一步明晰了企业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重要地位。新征程上,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肩负着新的责任使命。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企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性微观主体,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构成主体。相比高校、政府、社会大众等创新主体,企业具有离市场最近,对市场需求反应最灵敏、场景痛点把握最全面,适应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愿望最强烈,对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机制最灵活等突出优势。企业是产业体系核心构成单元和国家创新体系核心主体,强化其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强调要提高大中型企业核心竞争力,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对建设“科技强国”作出系统性战略部署,提出要全面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并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企业创新活力不断激发。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创新环境日益完善,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增强,创新主导的内生动力、能力和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创新领军企业已经有能力与高校院所一起,参与科技强国顶层设计和重大决策,发挥科技创新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有意愿和能力成为科技创新决策、重大创新场景构建、基础研究投入、人才引进、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体现了党中央基于对科技创新规律趋势的准确研判,是面向新形势作出的重大部署。

新征程上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

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要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积极鼓励、有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创新,推动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重大原创技术突破中发挥作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和科技领军企业的主导地位,成为新征程上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

当前,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和极端风险叠加的背景下,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企业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企业投入基础研究不足,自立自强的能力和责任担当不够,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基础不牢、底气不足、活力不高、生态不优。山东是经济大省,也是科技大省。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省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山东省企业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达到39.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仍然存在着科技领军企业作用发挥不够、产业龙头企业偏少、创新活力不足、企业应用基础研究薄弱、产业结构偏传统重化工业、企业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尚未形成等短板弱项,亟待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应当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从制度上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多管齐下全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创新主导地位。要抓住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探索建立健全全国企业科技创新长效机制,筑牢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加快培育科技领军企业,激励其增强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加强自主研发,强化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支持其通过“链长制”和创新联合体等方式发挥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的引领支撑作用。赋予领军企业负责人更多的资源调配权、产业联盟建设权,产业标准制定话语权。对领军企业及其负责人的考核要关注产业整体竞争力,统筹兼顾企业自身领先发展和领航产业整体发展两大责任目标。加强对企业重大决策的领导,推进领军企业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创新引领发展成效。

激发首创精神,支持“两家”发挥更大作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需要尊重企业家,激发强化企业家精神与首创精神,培育适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要求、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新需求的战略科学家和战略型企业家(“两家”)。未来要给予战略科学家和战略型企业家在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立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决策方面更多的参与权,逐步形成科技领军和骨干型企业引领支撑高校、科研院所推进重大科技项目的新局面,全面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产学研协作不畅、产业技术落后、科技成果转化难的症结。

激励企业成为基础研究的重要主体。研发投入尤其是应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日益成为制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链现代化、产业链现代化的瓶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应用基础研究中的“出题者”“答题者”和“阅卷人”作用,加快全国重点实验室改革,支持在领军企业设立更多重大科技平台。加强对企业总部研究院等高层次研发机构的建设,对设立企业总部研究院,大力投入前瞻性、引领性和基础性研究的企业在财政、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健全普惠性科技金融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科技创新成本,提升企业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能。进一步支持企业牵头重大科技创新任务、科技基础设施和科技平台建设。支持企业总部研究院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联合承担国家实验室平台建设,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院、颠覆性技术研究院等高层次、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立企业主导的新型科技创新体系。

建立企业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重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和现代产业链链长企业的主导性作用,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需求场景,以科技领军企业牵头主导、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打造高能级数字联合体和创新平台,最大程度释放新型举国体制整合党的领导和、有为政府、有力主体、有效市场和人民参与的制度优势。以高能级创新联合体为抓手,深入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加快培育本地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立健全企业主导的新型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打破多主体协同低效、利益纷争、重复研究、成果转化难、收益分配激励不相容等制约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痛点,建

构从源头创新到成果转化的贯通式“创新循环”。

支持企业成为人才“引育用留”主体。加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和企业人才使用体系的深度融合。以企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场景、市场真实需求问题牵引,发挥企业在人才引进、培育资源支持、人才使用、留用和成长的场景优势,突破以高校为主导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下校企衔接不畅、重知识传授轻实践能力培养等瓶颈。支持企业通过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多种方式,以及学术导师+产业导师的“双师”制,推进产学研人才融通发展。进一步推动企业首席科学家等岗位,与战略科学家和战略型企业家相互补充促进,有效牵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重视场景驱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具有丰富应用场景和放大创新收益的优势,吸引和激励企业参与国家发展与安全重大场景的任务设计和创新平台建设。通过重大场景驱动和产业政策引导,支持龙头企业发挥在场景驱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向产业链开放创新资源,构建支撑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产业平台。进一步激励专精特新企业和中小企业发挥在细分领域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以战略敏捷性和创新活力参与到领军企业的创新链和供应链中,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深度融通创新的新型产业生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韧性发展。

支持领军企业牵头培育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最重大的技术经济范式。就山东而言,山东近年来通过一系列数字赋能举措,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累计培育海尔卡奥斯等4个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已跻身全国第一梯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塑造起新引擎新动能。未来要瞄准产业数字化深度转型的普遍性痛点难点,支持企业牵头和参与数字经济重大场景建设,加快实施工业企业数字赋能、工业互联网突破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支持海尔卡奥斯等领军企业牵头建设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浪潮云洲等企业牵头的数字化产业平台,强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相关标准体系,培育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以数字技术突破、应用拓展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赋能山东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步伐。推动形成数字驱动型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与数字创新生态,全面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效能,助力开辟区域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新赛道新领域,培育新动能新优势。

(作者分别系北京理工大学特别副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融合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抓好「银发经济」发展机遇

□ 刘姝辰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了“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对银发经济的重视,反映出党中央对增进我国老龄人口福祉、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深刻洞察。

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志;如果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则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则是超老龄化社会。根据2022年人口统计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由此可见,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带来了机遇。要想在这一趋势中掌握主动,需要转变观念,主动创新,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也称为老年产业,是指以老龄人口为目标消费群体,以老龄产品和服务为交易对象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种经济业态,在过去,由于老龄人口收入增速低、面临疾病等不确定因素多、财富积累较少、新品体验意愿低、消费动力不足等原因,银发产业受到的关注度不高。但随着老龄人口快速增长,我国养老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老龄人口的财富积累、收入保障、消费观念、教育文化程度、市场需求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老龄人口整体的消费能力、消费潜力、消费需求等都有了极大提高。随着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未来老龄市场潜力巨大。根据全国老龄委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8亿,未来消费潜力将增长至百亿级,我国也将成为全球老龄化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

从银发经济的市场结构来看,银发经济将是未来经济创新的重要领域。从实践来看,传统的养老产品主要包括两类:以医护、看护为主的养老服务,以及“衣、食、住、行、用”为主的刚需养老消费。而随着养老模式和消费观念改变,“安养”和“乐活”成为最新的消费热点,老年消费逐渐呈现出品质化、多元化、舒适化、便捷化的趋势。老年群体对于科技智能产品,特别是身体健康数据监控、智能远程呼叫、扫地机器人等新型产品的兴趣提升。拥有空闲时间的低龄老人对短途旅行、老年大学兴致盎然。独居的空巢老人对老年社交服务的需求增强。一个包含新型产品、老年旅游、娱乐社交、老年教育、传统养老产品的全方位需求格局逐渐形成。大健康、生命医学、中医养生等概念也备受关注,中高端养老需求成为趋势。

山东是经济大省,也是老龄人口大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截至2022年底,山东省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6.72%,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山东要主动作为、主动创新,把发展银发经济,既作为满足老龄人口需求、提高老龄人口福祉的重要抓手,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全方位优化养老产品尤其是刚需养老产品的有效供给。未来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对养老产品尤其是刚需养老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出了考验。刚需养老产品主要包括基础性医护服务、衣食住行用等刚需产品。山东人口众多,老龄化程度高,未来的养老需求十分强劲,保证刚需养老产品的充足供给是银发经济的底线和基础。其一,要提高基础性医护服务供给,增加养老机构数量和容量。政府要大力推进公立养老院和民建民营养老机构建设,扶弃包办包管的传统运行机制。在适当条件下,政府可减轻养老机构的部分税负负担,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的运营环节。要支持具有扩容能力的养老机构扩大规模,增加养老服务床位。在满足家庭困难、失能失智老龄群体需求后,养老机构可向其他群体开放床位,提高老年人群入住率。其二,要提升老年用品供给,需要立足传统老年消费品的产业优势,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企业品牌。积极鼓励龙头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研发生产老年服装鞋帽、老年保健食品、老年文体用品、老年康复器具等传统老年消费品,提升生产效率,扩大品牌效益。

细化消费市场,创新和培育银发经济新业态。老年群体消费正从刚需传统消费逐渐向医疗保健、老年教育、娱乐旅游、新型产品等消费项目拓展。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要把握老年群体消费需求的变动趋势,合理布局和提升产业配置。生产者要充分了解老年消费需求与痛点,细分老年消费市场,在细分领域认真钻研,反复思考养老产品的“适老性”。针对老年人科技产品的需求,要大力提升数字化、智能化在老人生活辅助用品、电子健康监测仪器中的使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养老品牌。顺应老年人文娱、教育的精神需求,要加大老年人短视频与交友平台的投入,改进现有App,打造老年人友好模式。要摸清老年人群的兴趣爱好,为老年人打造量身定做的兴趣班。要用好资源禀赋,注重银发经济与现有旅游资源的结合,打造康养式旅游景区,实现老年人“边游边养”。

加强法律监管,防范养老产业风险。保护好老年群体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好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提升老年群体消费信心、发展银发经济的前提。随着银发产业的发展,适老产品推陈出新,数量繁杂。一些不法分子借假销售新型养老产品之名,行诈骗之实。针对上述现象,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引导和行业自律的作用,细化产品质量及服务标准,实施规范制定和政策,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标准化。另一方面,要注重营造合法有序的老年消费市场,加大执法力度,对养生保健、投资理财等领域进行重点整治。将顶层设计与现实经验相结合,认真研究各类养老产品骗局,寻找漏洞,总结经验,进行科学化、专业化政策制定。政府机构牵头发起,联合行业协会,团结广大消费者,构成三方监管主体。此外,要不断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开通老年人绿色通道,对老年消费者权益维护予以程序上的便利。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数字人民币将带来什么

□ 刘凯 郭明旭

货币,其本质都是取得金融业务许可的特定金融机构对公众的直接负债,而数字人民币则是中央银行对公众的直接负债,因此二者在资产安全性方面存在一定区别。此外,相较于余额宝、零钱通等可以获得利息收入的这部分电子货币,数字人民币是不计付利息的,二者在收益性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别。

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货币数字化是货币形态发展和演变的必然趋势。随着数字支付的发展以及零售业向线上的转移,世界范围内现金支付作为支付手段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使得线下交易与现金使用的场景迅速减少。然而,当现金支付的缺陷(如易丢失、存在找零成本、存取不便利等)与线上支付的必要性(如疫情等因素导致无法线下支付)迫使人们必须选择数字化支付方式时,中央银行却无法提供数字化法定货币来满足人们的这一需求,公众只能选择风险程度相对更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电子货币进行支付,这无疑增加了支付体系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是中央银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缺失。因此,发行数字人民币是中央银行作为公共部门的义务所在,即维持公众直接获取法定货币的渠道,并通过现金的数字化来保障数字经济条件下记账单位的统一性。通俗一点来讲,就是在未来数字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纸币形态的现金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当人们在某些特定场合需要现金时,人们可以获取数字人民币。

发行数字人民币也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人民币体系建设可谓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基建”。从目前数字人民币的定位和设计方案(替代M0,不计付利息)来看,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及其与其他数字支付手段的协同发展,有助于降低货币发行与流通成本,促进支付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提高支付结算效率和支付安全性、提升金融普惠性以及打击洗钱、逃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和居民福利。从更长远的视角以及国际货币竞争的视角来看,未来数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可以与时俱进、不断优化(比如具备跨境支付和结算功能、可计付利息),届时数字人民币还将在丰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助力宏观调控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具有多重潜力。

实际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央行数字货币未来将成为大国货币竞争的重要领域。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报告,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已开展了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及试点工作,其中加拿大银行、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等中央银行的研发工作位于世界前列,美国也在2022年公布了关于数字美元的研究计划。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有助于中国参与数字货币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掌握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话语权,进而在未来的国际货币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贡献中国方案。

与数字支付协同助力经济发展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与流通将会降低公众的纸币现金需求,推动无现金时代的到来。数字人民币基于可编程的数字化支付平台,具有离线支付且易于分割等功能与特性,其交易便捷性胜过纸币现金。在安全性方面,数字人民币与纸币现金均为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具有同样等级的安全性;从个人使用角度而言,数字人民币具有可溯源性且不易丢失和损坏,因此大幅提升了交易安全性。一般而言,公众选择持有纸币现金更多是由于纸币现金具有更高的交易效率与安全性,而当数字人民币的支付便捷性、安全性均超过纸币现金时,数字人民币势必会对纸币现金形成替代,这也符合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人民币的定位。

数字人民币是对现有支付体系的有益补充而非替代,将协同第三方支付平台共同助力经济发展。相较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电子货币而言,在一般情况下,数字人民币的支付便捷性并没有明显优势,甚至其收益性要低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计息理财产品。事实上,数字人民币发行的目的并非替代第三方支付平台,而是满足人们数字化现金的需求,并打破平台之间的壁垒,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同发展,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和安全的支付系统。例如,在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难以覆盖的地方和场景(如在没有移动网络的地方或没有支付宝、微信账号),数字人民币将发挥作用。因此,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与流通一方面会促使人们将部分纸币现金转换为数字人民币,另一方面由于数字人民币与有息存款之间转换更加便捷,人们更倾向于减少货币持有量并增加储蓄,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则是居民部门的通货存

款比不断下降以及货币乘数的增大,进而提升社会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以及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此外,数字人民币如果未来在企业与商业银行层面普遍推广,其技术优势还将有助于降低金融摩擦,提升金融普惠,这些都将会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有益影响。

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

当前,社会公众对数字人民币和新支付方式接受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应加强与数字人民币和数字支付相关的社会科普与宣传工作。数字人民币是面向所有社会主体发行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人们对数字人民币的接受和使用程度决定了数字人民币的经济影响能否发挥到最大。由于数字人民币在使用体验上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电子货币差异不大,公众没有强有力的动机来改变自身的支付行为与储蓄习惯,甚至有部分人对数字人民币发行的初衷产生误解。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做好数字人民币的宣传与推广工作,一方面向民众科普数字人民币相较于其他支付方式的不同定位与优势,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打破当前支付平台之间存在的壁垒,弥补这些支付手段的不足,让民众体会到切实的支付便利与高效。社会公众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待数字人民币的角色和定位,给予其足够的包容和耐心,对数字人民币相较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相对使用规模不宜过度解读。

数字人民币相关的制度规则尚不完善,应在试点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完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央行数字货币是一个新生事物,具备了传统货币所不存在的许多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及相关部门要不断丰富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完善相关设计和基础设施,其中也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确立和完善,加强隐私保护,提供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等措施,加强数字人民币相关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评估,确保数字人民币相对传统纸币在支付效率、使用成本、安全性等方面的优势,全力打造一个更加快速高效、可靠稳健、开放竞争的数字货币支付体系。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先声

作为支付的新方式,“数字人民币”正在融入人们日常生活。近期,山东济南、青岛作为新一批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城市,正在数字人民币消费场景上加速扩容。

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已开展三年,试点范围涵盖了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西部、东北、西北等多个地区。从应用场景来看,数字人民币已覆盖了生活服务、日用零售、交通出行、政务服务、工资发放等多个主流线上及线下应用场景。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积极同国内多个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展合作,共同促进数字人民币双层运营体系的建立,数字人民币体系不断完善。数字人民币有何特别之处?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数字人民币”,将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是“法定货币”,不是“数字钱包”

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不同于比特币、天秤币等由算法或者企业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由中央银行发行,以国家主权为主要信用来源和信用基础,因此具有法偿性与最高级别的安全性,同时也具备价值尺度、交易媒介、价值贮藏等基本功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目前的设计方案,数字人民币与实物人民币同属于M0(流通中的现金)范畴,其最显著区别在于物理形态的不同,也正是因此,数字人民币相较于实物人民币在支付便捷性与支付安全性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兼顾了实物人民币和电子支付工具的优势。

数字人民币与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有着本质区别。首先,支付宝、微信属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与商业银行的手机App或数字人民币App一样,都是一种支付方式或支付工具(亦可理解为数字钱包),而数字人民币是货币而非支付平台,二者属于不同范畴。其次,支付宝、微信等支付平台中的电子货币与数字人民币也存在显著区别。不论是存储在余额宝、零钱通等理财产品中用于获得利息收入的电子货币,还是存储在支付宝钱包、微信钱包中用于日常消费的电子